

中 国 文 学

(宋元 明清部分)

吉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出版

西南师范学院翻印

1961. 11.

目 錄

第一章	社会情况与文学发展	(1)
第二章	北宋詩文作家	(11)
一	王禹偁	(11)
二	欧陽修、梅堯臣和苏舜欽的政論詩	(19)
三	王安石	(22)
第三章	苏轼及李清照	(29)
一	苏轼	(29)
二	李清照	(38)
第四章	爱国詩人辛弃疾	(41)
一	辛弃疾生活时代的爱国思潮与爱国文学	(41)
二	辛弃疾的生活道路	(43)
三	辛弃疾的爱国詩篇	(44)
第五章	偉大爱国主义詩人陆游	(47)
一	詩人的生平事迹与創作道路	(47)
二	詩人的爱国詩篇	(48)
三	詩人的其他詩篇	(56)
四	詩人創作成就的主要原因	(59)
第六章	話本与說唱文学	(62)
一	話本小說	(62)
二	說唱小說	(75)
	結語	(86)

元 代 文 學

第一章	緒論	(91)
第二章	偉大的人民戏曲家关汉卿	(98)
第三章	王实甫的《西廂記》	(117)
第四章	元杂剧創作的发展	(125)
第五章	元代詩歌	(139)
	元代文学結語	(148)

明 代 文 學

第一章	緒論	(149)
第二章	明前期的戏曲	(154)
第三章	崑曲的兴起和明中后期的戏曲	(164)
第四章	湯显祖 (附沈璟)	(172)
第五章	明代小說緒說	(182)
第六章	罗貫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187)
第七章	《水滸傳》	(198)
第八章	吳承恩的《西廂記》 (附《金瓶梅》)	(217)
第九章	明代短篇小說	(232)
第十章	明代詩歌、散文和文学理論	(239)
	明代文学結語	(265)

清代文学 (鴉片战争以前部分)

第一章	緒論	(267)
-----	----	---------

第二章	清鴉片戰爭以前的小說概述	(269)
第三章	蒲松齡	(264)
第四章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286)
第五章	曹雪芹、高鶚的《紅樓夢》(附《鏡花緣》)	(302)
第六章	孔尚任的《桃花扇》	(338)
第七章	洪升的《長生殿》	(350)
第八章	清鴉片戰爭以前的其他戲曲	(356)
第九章	清鴉片戰爭前的詩、散文和文學理論	(360)
	清鴉片戰爭前的文學結語	(376)

晚清文學

第一章	緒論	(377)
第二章	太平天國和反映各民族起義的文學	(382)
第三章	現實主義詩人黃遵憲和這一時期的詩歌	(392)
第四章	李伯元、吳趸人及這一時期的小說	(406)
第五章	成兆才和這一時期的戲劇	(418)
第六章	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	(426)
第七章	文學理論的新形態	(431)
	結語	(437)

宋 代 文 學

第一章 社会情况与文学發展

北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的“战斗不已，生民涂炭”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專制主义的帝国。

在長期封建制度的發展中，从晚唐到五代，封建統治者的內部矛盾日益激化，軍閥的封建割据趋势，积重不反。北宋建国以后，首先解除宿將典兵，削去节度使軍权，加强了三衙禁軍，改變了兵制，由中央直接控制全国的軍事力量。其次設樞密、三司、审官等院，使中央机关直接为皇帝負責，設通判县尉等职使地方权限掌握在中央。并且以官职相离，分割事权，互相掣肘，严密监察的方法防止大臣专权軍帥坐大。而在錢粮方面，严格限制地方的財权，除地方行政經費（所謂“应在”）外賦稅征收完全归中央管轄。宋朝就这样使軍权政权財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構成了高度集权的專制机构。为了扩大地主階級参政范围，巩固封建王朝的統治，宋朝曾扩大科举名額，一榜就录取七八百人，实行优厚薪俸，一个官享有十多种的合法錢物。形成貴族与官僚的分赃局面。集权政治虽然是封建政治制度發展中的必然結果，对于巩固統一安定社会秩序乃至發展社会經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正在这种封建統治之下，宋朝造成了內重外輕国防虛弱，官僚机构臃腫癱瘓，人人因循，統治者穷奢极欲追逐享受等等恶果，从而加深了階級矛盾与民族斗争。

与加强集权制的同时，北宋王朝在社会經济方面繼承着五代而进行了某些改革。統治者为了开发稅源，緩和階級矛盾，

曾下令专官赴各路“均田”，并奖励农民开垦，及免税耕牛，提倡农田灌溉等，因而大批自耕农和复员士兵获得土地，农业上小土地所有形成普遍形态。这使北宋农业相对提高，农村情况相对好转。另外，北宋王朝还订出“商税则例”（《通考》，整理交通漕运（如河转船法的施行，驛傳、郵鋪等的設立），“通蕃互市”，扩大貿易范围等，这又使北宋工商业和商业城市获得进一步发展。北宋的官营作坊规模頗大，有細密分工，接近手工場組織。当时的商品生产，根据宋史地理志，各路所貢的工艺品，可以看到手工技术的发达及分工的細密。在“商賈交湊”，通蕃互市”的情况下，商业極為发达。这由商稅的增加（如至道年間，商稅四百万，庆历年間，商稅二千二百万，熙宁年間，仍为八百五十四万），貨幣使用的增多（北宋初年。四川已以紙币交子事貿易此不断。另外，有錢幣通用），可以得到証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空前发展，首先使一些大城市空前繁荣。北宋开封有二十万户。开封規模之大，商业之盛，文化生活的高漲，曾引起当时文人以专书进行記錄。敘述了城市生活戏場艺人，以及文艺活动。如《夢梁录》（吳自牧作），及《东京夢华录》（孟元老）是。汴京以外，如西京、北京、成都、兴元、眞、楊、梓、夔、滄、雄、广、泉、明、杭、松江等州，不下四十余处。其中人口达二十万户的有七处。这样，城市市民人数增多，有他們的工作需要，有他們的生活要求，来自唐五代的文学市場日漸得到扩大与增加。城市的艺人自然在人数上有增加，在业务上有分工，有了行会制度（如书社、雄辯社很出名）。

北宋的田賦制度（三稅），自始就是很腐敗的。形势戶享有減稅特权之外，拥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也享有免税权利，他們是所謂“僧祇戶”和“道觀戶”。沉重的租稅負担落在农民身上。而且在封建經濟的發達中，田地逐步集中，所謂“貧下之戶为豪强兼并”（朱勔占有田地三十万亩），統治

階級又殘酷的把美好的民田括為公田（參看《楊戩傳》），這樣又使農民失業，喪失生活條件，引起了階級衝突。另外，北宋王朝對商業和手工業實行大規模的官營與專賣制度，設有“作坊”與創作局，派有作坊使等官，以搜括財貨，供皇帝貴族的生活享受。並逐步加重稅收，至於“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小商賤賈，千百之获，皆有。以征”（叶适《水心文集》四）。剝削勒索之慘已不亞于五代十國的“百物皆稅”，而官營“邸”“坊”却没有商稅負擔，這種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封建性的壟斷商業，阻礙了自由商業和手工業的發達，使當時的社會矛盾更趨複雜化。

北宋統治者意識到封建政治經濟制度的沒落與危機，想利用這些冗兵冗官來統治人民。但冗兵冗官增加了封建剝削，使得階級矛盾更加劇烈。統治者的奢淫與無能削弱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力量，他們對遼夏奴主的侵凌與要挾，採取了妥協的策略，把剝削來的財物愈來愈多的拱手送給敵人，這樣就使宋朝社會財富一天天枯竭，敵人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使階級矛盾更加尖銳，也導至了民族災難。

封建剝削使人民無法生活，於是階級鬥爭趨于表面化。淳化四年（公元九九三），川陝境內出現了以王暉（或作波）、李順為首的人民暴動。他們“眾至十餘萬”，反對貧富不均，反對奸商的糶賤販貴，提出均貧富的口號。咸平三年（公元一〇〇〇），景德四年（公元一〇〇七），宜川戍卒兩次暴動，與防軍骨干及軍士共同起義。慶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沂州士兵和人民，以軍士王倫為首，舉行暴動。宣二年（公元一二〇），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方臘，聚眾至數萬舉行起義。劫富室殺官吏士人，對統治階級提出反對剝削反對妥協的革命檄文。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以宋江為首的三十六人起義于河朔一帶，使當時的官兵不敢抗衡。北宋的農民起義已經有着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這就是，他們不但有長期准

备，有严密組織，規模比較大，而且他們有起义的口号和檄文，其中有市民有軍士參加。他們以革命行动同階級剝削与种族压迫作斗争。

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災患，不能不动摇宋王朝的封建經濟基础。为了緩和階級矛盾，为了改良政治經濟方面的弊端，为了有力量抵御外侮，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新法”。

“新法”是从中間阶层利益出发的一种“改良”政策。是为統治階級整頓政治經濟来加强封建制度的。当然“新法”的理論本身及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种改良政策也不可能实现，在进行实施中也发生不少弊端。等到“新法”变质以后，六賊加剧封建剝削，更是促进了階級矛盾的尖銳程度。

正是在这种階級斗争，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銳的现实的作用下，关心国事反对暴政的进步詩歌和政治論文获得了新的发展。

腐朽的北宋王朝以汴京淪陷，徽欽二帝被金人虜去而宣告灭亡。

以宋高宗为首，所建立的南宋，是腐朽的北宋王朝的繼續，是中国历史上最怯懦最可恥的一个朝代，南宋統治者受其階級根性和个人私利的支配，在外交上一貫坚持屈膝投降的政策。随着外患的日趋严重，統治者内部产生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的激烈斗争。以李綱、宗澤、岳飞为首的主战派，他們坚持民族大义，反抗入侵奴主与人民义軍联合在一起，奋不顾身地反击敌人，保卫了半壁江山，他們的爱国行为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要求，卓越的抗战業績永垂青史。而以秦檜为首的投降派，則不顾民族和人民利益，向敌屈辱求和以維持其統治地位，把抗敌將士当作眼中釘，相继打击了李綱，逼死了宗澤，以“莫須有”罪名杀害了岳飞。因此，北宋的民族斗争，主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实质就是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在金奴主的侵略和統治下，北中國人民發揚了不屈不撓奮勇抗敵的愛國主義精神。當時義軍濫起，在各地區給敵人以致命打擊。如河東農民組織了紅巾軍，這支武裝力量具有很強的鬥爭威力，每戰必給金兵以致命打擊。太行山一帶人民組織了“八字軍”，他們團結了許多兄弟義軍，有根據地，影響範圍很廣，屢敗金兵奪回無數的人口財物。此外還有陝西義軍、五馬山義軍、紅襖軍等，匯在一起是一支抗击金兵的强大主力。正是這些力量不斷地打擊了敵人的瘋狂進攻，支援和協助了南宋的愛國官兵，從而使中國的半壁江山免于被金人吞沒。實際上，大河南北的人民義軍成為當時民族戰鬥的主力，成為當時保家衛國抗敵御侮的號召者與後備軍。在金奴主蹂躪下的北中國人民，一面堅持着不屈不撓的鬥爭，一面盼望着南宋官兵的北伐，可是南宋統治者却不顧人民意願而發出“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的無恥的漢奸謬論。南中國人民對封建統治集團的對外屈膝求和對內殘酷鎮壓懷着仇視與鄙視的感情。以鍾相、楊么為首的農民軍曾經奪取財富均分給人民，實現“均貧富”的主張，強烈地打擊了地主階級。另一方面却嚴詞拒絕了偽齊劉豫的招降，願意同南宋官軍協力抗敵，這表現了人民的既反對階級剝削，又反對民族侵略的正確立場，也表現了階級利益服從民族利益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正是人民反封建反壓迫的英雄事跡，和為國獻身不屈不撓的抗敵行為形成了宋代愛國主義文學傾向，提供了可貴的思想內容，匯成了當時的進步文學主流。

北宋偏安江南，臨安、建康、瑞安、泉州等城市逐漸發展繁榮。當時的臨安（今浙江杭州）由於是南宋京都遂成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人口最多達到百萬餘家。商業手工業比北宋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城內有金銀、珠寶、綵帛、米、鐵器、印刷書業、雜貨等市、以及茶莊、酒館等，金錢交易，通宵達旦。真是“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

不盡”，呈現出“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的發達繁華景象。在城市空前繁榮的基礎上，出現了更多的專門藝人和曲藝行會組織以及“瓦肆勾欄”。當時的講史、小說、戏曲、講唱文學等有更大發展，獲得了傑出的文藝成就。

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深刻化，以及書院的普遍設立，印刷業的空前發達，兩宋的學術文化有了進一步發展並且表現出兩種文化和兩種傾向的鬥爭。以程朱學派為代表的“理學”，糅雜了佛教道教，樹立了為地主封建統治服務的新的儒家學說，他們的心性之學是道地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南宋時代，“理學”風行一時，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與此同時，反映中下層文士和自由商人的某種進取思想願望而攻擊封建統治強調個人功利的新學派也應運而起，如葉適的批判主義和陳亮的功利主義可為代表。

作為農民鬥爭的產物，以平均主義思想為特色的則是以康與之《昨夜錄》為代表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與程朱學派為地主統治階級服務的“理學”體現了兩種文化的鬥爭。

“理學”是封建地主階級學說。它一開始就顯示了維護封建道統提倡君臣大義的特點。但是在北宋初，當孫復、石介等人繼承韓柳傳統要求文章要明道致用，反對五代宋初形式主義文風，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為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开辟了道路。而“理學”家們，則着重哲理道統的探討，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俳優小道，則又阻礙了文學的發展。宋代一些政論詩的質樸無華，議論多而藝術表現少，同這種風氣是不可分的。

與文化學術一樣兩宋文學有了不小的發展，表現了兩種文化和多種派別的鬥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來自民間的小說戏曲等新興文學初步獲得勝利，而發揚蹈厲的愛國主義詩歌作品呈現出燦爛的光輝。這個將近三百年的文學寫作不僅豐富了祖國文學遺產的寶庫，並且為近世文學新的發展道路鋪下了基

石。而作为主要体裁的古典詩歌至此为使用全民語言的小說戏曲等新兴文学所代替。

北宋初，在天下暂时統一，社会表面繁荣的形势下，一些官僚文人承继晚唐五代貴族的形式主义文风。以浮靡纖絕的詩詞写紙醉金迷中的生活情調，其代表是以楊亿、刘筠等为首的“西崑体”詩派和以晏殊为首的貴族詞。“西崑体”，所謂館閣体詩，是模仿晚唐李商隱的。在內容上是“綴風月，弄花草”案物題詠，应制頌德，在形式上是追求华丽，穷妍极态，注意韻律和修詞以及用典用事。“西崑体”的作者不但在京師造成一种文风，而因为他們职掌貢举，有意識地提倡“西崑体”至使天下举子把楊刘等的文章作为范本，因而“西崑体”的流行前后达四十年。

与“西崑体”詩派沆瀣一气地的是晏殊父子的詞。晏殊是当时官僚文人的代表，他們俸祿优厚，生活闊綽，每日必吃酒，吃酒就有舞队歌者佐筵助兴。在这种养尊处优的貴族生活环境中，填写小令，以表达他們的“閑雅”生活虛无情緒或者是男欢女爱。这种貴族詞风实际上是五代花間派的繼續。

在“西崑体”詩和晏氏父子詞歪曲现实粉飾太平的同时，王禹偁却以他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詩文，描述了殘酷的封建剝削如何把民脂民膏納入官仓府庫，表现了人民的流离死亡与封建統治者的奢侈享受形成鮮明对比，可以認識到楊亿晏殊写作的反动性，也認識到从北宋一开始，就在文学創作上存在着两种不同傾向的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代表中小地主的中間阶层知識分子的政治力量不断高漲，他們的政治学术观点反映在文学上，首先是反“西崑体”的古詩文革新运动。这一运动，是中間阶层文学集团对大官僚大地主文学集团的斗争，是社会矛盾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柳开、穆修、石介等，是这运动的先驱，他們以韓愈为师，直接承認韓愈的道統与文統相結合的

論點又加以擴大，主張文學寫作要“明道致用”“尚朴重散”，用這種理論明目張胆地向典麗淫靡徒具形式的“西崑體”進攻，柳開、石介等的這一古詩文革新運動初步地打擊了當時的“西崑體”。

到了十一世紀三十年代，歐陽修與尹洙等再次開展了詩文革新運動。他們作古文寫古詩，反對“西崑體”的駢體時文與詩賦。等到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歐陽修與梅堯臣等主持貢舉（考試）。他們對舉子的試文，限令一律寫平淡朴素簡明典要的古文，嚴斥華而不實“自為奇僻，鉤章棘句”的文風。宋朝著名的古詩文家如王安石、曾鞏、蘇軾等就是在一種考試規程中被歐陽修提拔起來的。歐陽修的這種措施，進一步打擊了風靡一時的“西崑體”，初步收得了“自是文體亦少變”的效果。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是在歐陽修等不懈地創作實踐中尤其在他利用貢選取大力推行古詩文的措施中獲得了勝利和發展。

應該指出的是古詩文革新運動是地主階級內部矛盾在文學上的反映，它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不同階層、集團的不同利益與要求。從宋真宗（公元1040—1042）以後，在科舉制度上已有重德行與重文學，考詩賦與考策論之間的鬥爭，可見歐陽修的提倡古詩文，以古詩文來進行考試是符合封建統治者的利益，是為當時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并基本上為它服務的。正是因為這樣，“西崑體”固然很多華麗的有毒的東西；古文古詩也有一些充滿着封建糟粕。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古詩文革新運動在改變文風發展文藝創作上的意義。以蘇軾、王安石為首的詩文作家的成就，與這種運動的持續發展是有關聯的。當然，與此運動同時，更頑固的文人也掀起了一股崇古復古剽竊古人的逆流。代表者是氾濫兩宋之間的“江西詩派”。

詞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學體裁，它發生在晚唐而發展在兩宋。它來自人民而充分利於進步詞人的寫作。貴族官僚文人

掠夺了这种体裁千方百计地使之为他们们的生活享受服务，但不能阻碍它的发展前途。随着北宋初古诗文革新的反形式主义的运动，词也逐渐突破贵族词的旧框子，而成为描绘生活抒情写志的文学工具。在晏殊同时，词人柳永已经接受了民间的最调慢词写的城市浪游和羁旅生活的作品。他的《雨霖铃》《八声甘州》等词表现了他生活遭遇与思想感情，比过去作者的作品是更生动更通俗更富于思想内容的了。但是由于所写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是属于落魄的地主文人和浪荡子弟的，其中充满了没落情调和肉欲色情，拘执于都市繁华和献颂功德，词的写作境界扩大了，词的思想内容却充满毒素或糟粕。阶级根性和生活实况限制了柳永的写作。资产阶级学者以人性论等错误观点，一再推崇柳永，把柳永捧上了天，这是十分不应该的。有的人提出晏殊等贵族词人曾反对和鄙弃柳永词，企图证明柳词的进步性，这也是无用的。晏柳的矛盾实际是地主文学派别间的斗争，或者说地主内部的斗争。

当然，柳永使用了长调，真切地表达他的生活情思，这为以诗为词的苏轼开辟了新的创作途径，也把词进一步当作抒情写事的文学工具，这一点转变，是应有充分的估价的。这一点转变与古诗文革新运动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派生物。

词这种长短句样式，较之五七言诗，是一个新体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接近了活的语言，因而容易和能够更委婉亲切地抒情抒事。然而提到词在两宋的发展仍是同其他文学一样决定于那个时代历史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化激剧化，以及人民群众的斗争在进步作者生活、创作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北宋灭亡以后，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英雄事迹和乐观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长时期地和有力地感染了一些具有民族气节坚持民族大义的仁人志士，并且在实际斗争中获得了锻炼，如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他们是民族英雄，

抗敌战士，同时又是作家或诗人，他们关怀人民疾苦，仇恨外族奴主，诅咒汉奸卖国贼，奋不顾身地来抗拒强敌恢复祖国，他们用这种思想感情和行径写下了新的词。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如此高度的思想性与教育意义，使宋词以及宋诗，在发展中前进一大步留下光辉的成就。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城市生产力，社会矛盾和城市文明进到了较高发展的阶段，城市艺人的词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说唱文学“诸宫调”，其中用的词、曲子更丰富了，语言更通俗了，艺术表现力更强了，不仅可以委曲婉转的抒情，并且可以绘声绘色地叙事写人，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这样就把唐代以七言诗写成的讲唱文学推进了一大步，进到高度的发展阶段。很明显，人民创造了词，人民也必然不断地发展它。从而以“诸宫调”这种文学样式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但是，在城市艺人不断发展词作的时候，两宋时代的地主贵族文人也使词的写作陷入形式主义泥沼。他们讲究的格律和词藻。用词来粉饰现实歪曲现实。他们许多作品都是华而不实和空洞无物的。如北宋的周邦彦南宋的姜夔就是这些文人的代表。周姜的词同城市艺人的词同爱国作者的词呈现出不同倾向不同道路的斗争。

城市艺人在宋代是数量加多了，行会成立了，分工明细了，专家艺人出现了，所以在词和说唱文学之外，他们同时发展了话本小说使之达到相当高度的创作水平。这些文学产物，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诸种文艺间的互相作用影响，而呈现出进步性更强烈、艺术形式更丰美多彩的创作特点。总之诸宫调、话本与当时的爱国主义诗词表现了宋代文学的杰出成就，为近世文学奠定了新的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北宋詩文作家

一、王禹偁

当十世紀下半期西崑体盛行之时，也有許多承繼着前代现实主义文学傳統的作者，其中最有成就能夠反映现实的是直接继承杜甫、韓愈、白居易的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鉅野人。他世为农家，少年苦学能文，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登进士第，出任成武主簿，迁長州县令。雍熙四年（九八八），官右拾遺，直史館。次年，献《端拱箴》，《待漏院記》，在箴中，作者不是单纯地歌功頌德，而是十分尖銳地从皇帝的居室、衣着、飲食对比人民的飢寒貧穷与流离死亡，以揭发封建政治的弊端或者罪恶。甚而作者直接指出“聚民膏血”，“害民稼穡”等封建剝削与徭役的殘暴性。这同姚坦把貴族假山做血山是同一口吻。《待漏院記》也对于封建暴政作了細致的描述来諷諭皇帝和“旅进旅退”的官僚集团。也在个这时期，写了《平戎十策》。以后极言敢諫，触怒統治階級，淳化二年（九九一）貶商州团練使，写了“《畬田詞》和《感流詞》等詩。作了抨击封建剝削的《弔税人場文》。淳化五年（九九五），自解州召回，任諫官“左正言”，直昭文館，作《对雪》及“对雪示嘉佑”詩。次年，又貶在滁州，作了《官廨》等詩。这是在赵光义时代作者生活遭遇和創作的大致輪廓。宋赵恒（真宗）即位以后，咸平元年（九九八），作者預修太祖实录，因为“直書其事”，不加掩飾，以罪被貶到黃州，以此，后人常称作者为王黃州。作《三黜賦》統治者对他的黜貶并不能挫折他。他說“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黜而何亏！”咸平四年

(一〇〇一)，又迁蕲州，卒于任。年四十八。所著《小畜集》傳于世。

王禹偁出身农家，又历任知县知州，对封建政治的腐敗，人民百姓的生計之苦是有观察和体会的。而且由于坚持政治理想，遭遇坎坷，漂宕无定，他的同情人民不滿封建統治的思想感情比較強烈。他有意識地繼承杜、白、韓、柳等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傳統。他說：“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示子詩》），他說：“誰恰同好还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贈朱岩》）他认为文章是傳道明心的工具，應該句易道义易曉，反对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風。可以看出王禹偁詩歌的傾向与蘊蓄。

王禹偁在很多体裁的作品中，反映了阶级剝削的殘酷性，替人民进行呼吁与控訴。如《端拱頌》，《上許殿丞論榷酒書》等政論文；《弔稅人場文》《录海人書》等短篇散文，以及《对雪》《对雪示嘉佑》等五七言詩等，都是作者杰出的篇章。

在《弔稅人場文》里，作者揭示出这样一个傳說，“峽口鎮多暴虎，路人遇而罹害者，十有一二焉”。“行役者目其地为稅人場。言虎之搏人，犹官之稅人”。从而借稅人場的具体故事，反轉来表現阶级剝削的殘暴性。作者承认在野莽中害人最烈莫过于虎。但虎是可以捕杀的，虎患也是可以避免的，它的稅人的程度与范围都是有限的。封建剝削的为害人民則是普遍的与长久的。它合法化地吃掉人民，使人民破家灭族。它是以五刑三木做爪牙，以官吏監獄来吞噬。你有車馬也跑不掉，你有刀箭也挡不住。这个場子包括了全天下，这只虎危害到家家户户。它加到人民身上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作者說这只虎是任何打虎将所捕服不了的。作者还把北宋王朝的这种殘暴剝削与殷紂王、周厉、周幽王及汉武帝等的苛捐暴賦等同起来。作者这篇精悍的散文詩。是以仇恨的感情揭发了封建剝

創。其中對封建制度充滿了諷嘲與詛咒。是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羣眾反對封建思想感情的體現。作品顯然繼承着苛政猛于虎及捕蛇者說。其戰鬥性又是上述篇章所趕不上的。

其次，王禹偁又作《畧海人書》，借徐福入海求仙的故事，虛構出一幅人民理想生活的美麗圖景。那些共同耕漁共同生活的人們，他們“不聞五嶺之戍，長城之役，阿房之勞”，也沒有遭到“大半之賦，三夷之刑”。這是基於對封建剝削徭役不滿，才以這樣虛構的圖景寄托其原始理想生活的憧憬感情。所以在作品末尾，作者曾由人民的口吻，向統治者提出人民的要求。所謂“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這是基於作者對趙宋封建剝削徭役的不滿，以虛構的生活境界寄托作者的理想。

作者所虛構的故事顯然是繼承了桃花源記的藝術傳統。借具體的故事進行抒情，反對封建社會的剝削與徭役。又在《畧海人書》首先肯定無剝削的理想生活的可能性。即使是在孤島上，人們可以利用可能的條件經營美好生活。把苛稅苦役看成是妨礙這種理想生活的契機。趙宋時代各地通商互市，海外貿易已經發達。在海客們中可能有這種的生活傳說。作者可以把傳聞故事和個人的理想結合起來，表現趙宋封建剝削的殘暴性及人民仇恨封建制度的思想感情。另外，封建社會發展到宋代，封建制度日益在沒落，生產技術則益形提高與發達，人的生活的創造能力逐漸被肯定。正是歷史條件與環境決定了作品的時代特徵。自然，王禹偁的思想深處有着改良因素。這種因素的存在也是社會發展的历史必然性。恰如後來王安石的變法運動一樣，正有着所以派生此種信念的社會基礎。

從上述兩篇散文看，作者的寫作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他注意對現實的暴露，而且也的確暴露了社會現實。而這種暴露又符合了人民的思想感情。

《對雪》這是作者優秀的抒情詩之一。從淳化五年（九九